

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

张连红

内容提要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空袭之后直到12月13日南京失陷,南京就一直处在战争威胁之中。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虽然,经过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努力,市民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在心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准备,如向内地迁移、将女儿提前出嫁、避难安全区等;为应付日机空袭和战争威胁,政府及社会团体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民众工作。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人们对日军占领南京后可能出现的疯狂暴行,其认识显然不足。

关键词 战争威胁 政府的民众工作 市民心态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军队施加于平民的暴行事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因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但人们不禁要问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南京市民有无面对日军战争暴行的思想准备呢?本文试图转换一个视角以战争受害者南京市民作为考察对象,从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市民的构成、政府应对战争的民众工作和战争威胁之下市民心态3个方面,探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市民应对战争暴行的社会心理。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CZS007)的阶段成果。

一 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市民的迁移与构成

1927 年 4 月 18 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城市建设进程十分迅速,尤其是人口增长更为惊人。据统计资料显示,1927 年南京人口仅为 360500 人,1928 年已上升到 497526 人,到 1935 年时全市人口则突破了百万大关,达到 1013320 人。8 年时间,人口增速高达 280 %。其后,南京人口增长基本稳定,到 1937 年 6 月,南京全市共有 200160 户,1015450 人,其中城区人口数为 853781 人,乡区人口为 161669 人。但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特别是在 8 月 15 日日机对南京进行首次空袭之后,南京市民开始大规模向外地迁移,南京人口总数急剧下降。

为了掌握南京人口迁移情形,1937 年 10 月 16 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函南京市政府,要求将全市人口迁移情形,“迅予确查见复”,并敦促南京市政府此后需“按旬咨部俾资查考”。10 月 18 日,南京市政府乃命令各区“迅速查报,以凭汇复”。但是由于处在战乱之际,加上各区事务繁忙,特别是“因京郊建筑防御工程征调民夫甚多,本市乡区保甲长多赴要塞督工,致户口报告不免稽延”。直到 11 月初,南京市 12 个乡区中,只有 7 个区上报了统计数字(见表一),在档案中我们一直未能发现另外 5 个区的报告。但仅从上报的 7 个区来看,在 11 月初,南京市常住人口数为 37.3 万余人。由于当时南京市各区居民面临相同的战争威胁,市民向外迁移的程度相差不会太多,因此,我们可

《南京市政府关于分发本市生死统计表训令》(1937 年 11 月 26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16 页。

《南京市政府关于本市户口异动情形致内政部咨文》(1937 年 11 月 10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 914 - 915 页。

以推算出当时留在南京人口总数的概率。

1936年7月,南京市曾对常住人口进行一次较为精确的人口普查,如果我们以此为参照基数,对照1937年10月底和11月初所上报的7个区人口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南京市城乡各区人口数减少的概率。考虑到城区和乡区人口迁移情况的不同,我们计算其概率时将城区和乡区分开计算。表一显示:1937年11月初5个城区人口迁移概率是48.9%,也就是说城区人口中有近一半的市民离开了南京,1936年时7个城区人口数为741667人,根据城区人口减少的概率,迁移后的城区人口数应在37.9万人左右。1937年11月初,2个乡区人口迁移很少,其迁移概率仅为17.6%,1936年时4个乡区的人口数为203877人,迁移后的乡区人口则应在16.8万左右。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在1937年11月初,南京市常住人口中尚有54.7余万人留在南京。

表一 1936年7月与1937年11月南京市各区人口统计数

区别	1936年7月		1937年10-11月		
	户数	人口数	户数	人口数	报告时间
总计	181476	945544	86800	373092	
城区共计	142677	741667			
第一区	24724	134456	缺	缺	
第二区	17165	88679	9440	37324	10月27日
第三区	15629	84430	10119	38889	10月28日

这次南京人口普查,其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南京常住人口,因此,其调查南京人口数为945544人,没有达到100万人,但资料显示南京市总人口在1935年就已突破了百万,1937年6月南京市人口为1015450人。

1936年7月南京各区人口数的资料来源于南京特别市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编《南京市户口调查资料》(1936年,南京图书馆特藏部藏)。1937年11月初南京市各区人口数的资料来源于南京市档案馆,转引自钟庆安《关于一九三七南京沦陷前夕人口的考证——用档案材料驳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5期。

区别	1936 年 7 月		1937 年 10 - 11 月		
	户数	人口数	户数	人口数	报告时间
第四区	27092	138263	18076	70688	10 月 30 日
第五区	27655	140269	22785	108247	11 月 3 日
第六区	14633	79163	11288	50877	11 月 1 日
第七区	15777	76407	缺	缺	
乡区共计	38799	203877	15092	67067	
第八区	7325	30916	7625	29456	10 月 30 日
孝陵区	7558	50518	7467	37611	10 月 30 日
燕子矶区	13205	63472	缺	缺	
上新河区	9707	51805	缺	缺	
陵园区	1004	7166	缺	缺	

1937 年 11 月初,南京市民中尚有 54.7 余万人未能迁移这一事实,也得到了其它材料的证实。11 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曾召集各关系机关开会讨论关于遣送难民问题,并要求南京市政府将“遣送路线人数及区域即日呈函后方勤务部”,以便照办。11 月 23 日,南京市政府回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五十余万。除一部能自动离京,一部事实上决不能离京者外,估计需要遣送难民约二十万人左右。”10 月下旬,日本情报人员也报告称南京尚有 53 万余人。

但随着 11 月 12 日上海的沦陷和 11 月 20 日南京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南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移。“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

《南京市政府关于难民遣送致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公函节录》(1937 年 11 月 23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 915 页。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 年 10 月 27 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4 页。

〔美〕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1937 年 11 月 16 日,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2 页。

着成百上千辆装满了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在南京第二次迁移中,迁移人员主要以公务人员为主,另外尚有大量政府档案文件和相关物资,为保证国民政府各部门的安全迁移,“所有南京市区的民船全部征集编成号码,听候调遣,开往上游”。由于大小轮船受到交通部的统制,因此一般民众要坐船和乘车离开南京是相当困难的。据王正元回忆:“11月底以前,南京的轮船票就很难买了。自南京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后,逃难者蜂拥逃离南京,一张船票原值高出四五倍。辗转过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数倍。由于轮船都是停泊在江心,不敢靠岸,即使买到票的,也必须雇小木船登轮,而小木船也是漫天要价。”因此,尽管江边“人山人海”、车站“人多如鲫”,但真正能够有能力购买车票和船票而能离开南京的平民百姓为数很少,大部分难民被迫滞留在车站和码头。在第二次迁移中,我们现在已很难得知当时成功离开南京市民的准确数字了。11月底,南京市长估计尚有30至40万的市民还留在南京。

留在南京的市民中,基本上都是一些无力迁移的贫穷百姓。

〔德〕约翰·拉贝(John Rabe)著,本书翻译组译:《拉贝日记》1937年11月17日,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市区内船只登记就绪》,《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1日。

王正元:南京保卫战中的军话专线台,转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冯玉祥日记》(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页。

〔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集》,青木书店1992年,第90页。注:以当时南京的运输能力来看,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南京要迁移出10至20万人并不容易,这里南京市长的估计数字应为南京城区滞留人数。

在南京常住人口中,贫民所占比重较大,由于南京建都后城市建设急需大量民工,因此,江苏、安徽等附近地区的农民纷纷举家迁到南京谋生。据调查,在全市 945544 人中,本市人口数只有 251669 人,占总人口数的 27.858%,而来自于江苏、安徽两省的人口达到 470829 人,占全市人口总数 52.116%,另外,来自浙江、山东、湖北、湖南、河北和广东六省的人口也占总人口的 15%左右。我们从居住南京的时间中,也可看出南京城市的移民程度,据统计,在南京居住时间在 30 年以上者只占总人数的 13.19%,而在南京居住 5 年以下者所占比例则高达 49.67%,也就是说南京市内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南京不足 5 年。由于南京建都后成为一个重要消费城市,城市建设急需大量民工,如此众多的外来移民多以贫民为主,这从南京市特有的大量棚户人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1928 年南京棚户总数有 18300 户,大部分集中于秦淮河、水西门和下关一带。1934 年棚户总数占全市户数的 45.1%,1936 年时,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全市户数的 25.41%。据 1936 年的社会调查,在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达到 53.36%,无业人口为 318626 人,占总数的 34.76%。以保姆、佣人等为主要职业(人事服务业)的人数为 2036651,占 22.76%。由此可见,南京市人口总量中有半数之上的市民生活贫困。对于贫民百姓来说,在战争来临之时,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留在南京。

同上,第 12、32 页。

《南京社会》1928 年 11 月,第 229 页。南京图书馆特藏部藏。

《首都警察概况》,首都警察厅 1934 年印,第 136 页。

南京市户口统计专门委员会办事处编辑:《民国二十五年南京市户口统计报告》,南京特别市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 1937 年 6 月,第 56、52 页。

二 政府应对战争的民众工作

在面临强敌入侵的情况之下,政府有两大天职:一是发动民众积极参与保家卫国运动,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二是在战争不可避免失利的情况下,应尽最大努力保护民众,并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战争所带给民众的苦难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民众的损失。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空袭之后直到12月13日南京失陷,南京就一直处在战争威胁之中,在近4个月的时间里,政府应对战争的民众工作如何呢?

(一)在发动民众参与抗战方面。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政府发动民众参与抗战的各项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南京所进行的各项抗日宣传开展得颇有声势,除政府要员不断在电台进行抗日演讲外,各种表现亡国奴惨痛生活、刻划爱国者反抗斗争的戏剧和电影在南京不断上演,如军委会政训处抗敌剧团上演的《我们的故乡》、《八百壮士》在南京香铺营中正堂公余联欢社曾连续上演数天。从11月14日开始,由中国儿童协会主办的全国儿童抗敌漫画旅行展,在中华路青年大会堂展出。南京街头各种宣传活动也相当深入,抗日漫画、标语随处可见,“市内各处涂刷很多抗日标语,多数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致团结抗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等词句”。新闻报纸也经常刊登广告标语进行宣传,如:“不怕飞机大炮、只怕无勇气,不怕炸弹毒气,只怕无热血。”“军民齐心协力一致抗敌,打倒倭寇,打倒东洋鬼子。”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1日。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年10月2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第15页。

各社会团体还将抗日宣传同捐款救国运动相结合,各民众团体组织的捐款活动十分活跃。11 月 2 日,南京市商会发起一元救国运动,认捐者积极踊跃。11 月 6 日至 7 日,夫子庙各茶社歌女举办歌女游艺会,为抗战募得万元。11 月 15 日,首都新运会非常时期服务团发起一角募捐运动,走上街头挨家挨户募捐,以慰劳将士。同一天,南京市妇女界举办“救国公债劝募宣传周”,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亲自走上街头,“与大约 70 人在城里游说,鼓励人们认购‘自由债券’”。南京市民的捐款活动不仅形式多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参与的市民十分普遍。如“首都抗敌后援会”所发起的捐款运动,“对于捐款人除制给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收据外,并将其姓名及捐款数目,按日在中央日报京市新闻栏内披露,以昭信实”。据报道,从 8 月 13 日起到 11 月 20 日捐款总数为 33722.32 元,在这 100 天中平均每天收到捐款约 337 元,在捐款活动中,虽有一部分知名人士所捐数目为百元、数十元,但参加捐款的人中绝大多数为普通市民,其中 90% 以上的所捐款数为 1 角、2 角或 3 角。如以平均每人捐款 3 角计算,则当时参与捐款的市民至少在 10 万人次以上。

通过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和深入普及的捐款活动,“抗日”已成为南京市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从 8 月 15 日开始,南京经历了长达 4 个月的空袭,在每一次日机进行空袭之时,在军警和防护团成员的积极疏导之下,全市秩序井然,当南京市民听到敌机来袭的警报,“一会儿宪兵、警察及受过国民训练的市民,都发现于各街道上

《中央日报》1937 年 11 月 10 日。

《魏特琳日记》1937 年 11 月 15 日,第 151 页。

《中央日报》1937 年 11 月 20 日。

.....等到第三次紧急警报发出的时候,各街头上宪兵的岗位已经布妥,交通立刻断绝,车辆除军用外,一律停止行动,行人都避入避难所或两旁的屋里,一时全城鸦雀无声,在这一切的进行中,敏捷中含有无上的从容,紧张中保有整齐的秩序”。当日机夜袭时,则警报之后,全城所有灯光都会立即熄灭。每次空袭之后,宪警和防护团成员则立即组织抢救、清理等工作。南京井然有序的防空水平当时受到国内外许多媒体的称赞,就连日本情报人员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宪兵警察和防护团员的周全指挥,以及市民有秩序的行动,避难是在极其良好的秩序下进行的。”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南京城内几乎所有建筑都被涂上黑色或土褐色,“所有红色的砖瓦屋顶都刷成了黑色”,公共汽车也被涂成黑色,甚至连金女院所养的一些鹅也不能幸免,警察要求“我们应该处理掉这些鹅,或是把它们涂成黑色”。可见,南京防空工作的仔细!

在战争非常时期,城市治安显得尤其重要。当时南京治安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汉奸活动猖獗,为了防制汉奸间谍,南京市政府一方面强化城区自治工作,委派保甲长加强基层组织,通过联保切结,实行五户连坐。为了避免泄漏军情,宪兵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厅两机关,曾下令要求茶楼酒巴楼旅社及公共场所,“禁止侈谈国事”,“恐为汉奸窃听,泄漏戎机”。对于抓获的汉奸则召开公审大会,采取严厉措施坚决镇压。如8月26日,南京警备司令部公审枪决大批汉奸计黄濬等18名。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宣传教育

《从恐怖中得到安慰》,《中央日报》1937年8月16日。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年10月2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第15页。

《拉贝日记》1937年10月17日,第50页。

《魏特琳日记》1937年9月11日,第49页。

《宪警机关布告:禁止侈谈国事》,《中央日报》1937年10月5日。

活动劝告汉奸：“勿贪一时小利，危害国家，如因失业可求政府救济。”大街上则到处张贴标语，如：“做汉奸就是出卖祖宗，做了汉奸不得好死，做了汉奸遗臭万年，做了汉奸子孙不能做人。”另外，当时城内盗窃问题也很严重，许多小偷乘市民迁移避难，家中无人之际，“窃案频生，甚至冒充户主，而公然入室，搬取家具物件情事”。为此政府专门制发迁移证，“无证搬运概由岗警扣留”。为了防止谣言惑众，扰乱社会秩序，政府曾多次严令禁止，但由于处在战争时期，“谣诼繁兴”，从未间断，各项禁令效果显然不大。

为了应付非常时期，确保首都交通、供电和食品业的正常运作，从 10 月份开始，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非常时期工人训练处，将全市工人编成 5 个区队进行训练，训期 3 个月，训练内容为政治和军事两部分。到 1937 年 11 月 5 日，下关码头工人、自来水公司、面粉业工会等五个区 1898 名工人已接受了训练。为了鼓励工人在紧急时期坚守岗位，安心工作，政府为此曾制定十分优厚的条件，如对电厂职工，颁布了《紧急时期之抚恤办法六条》，对因日机空袭而伤亡者，一律给予 15 年薪金总额的半数作为恤金。南京的公共交通由于油料短缺，从 11 月 1 日开始，江南汽车公司宣布停驶市内三路和六路汽车。11 月 20 日，由于政府西迁，江南汽车公司的客车大都被征用，25 日，市内公交汽车全部停业。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之后，为防止市民恐慌而影响社会秩序稳定，唐生智发布文告，要求民众“沉着应变”，同时加强了城市治安管理，到南京沦陷之前，城内治安状况基本良好，几乎

《中央日报》1937 年 9 月 6 日。

《中央日报》1937 年 10 月 28 日。

《非常时期京市工人训练》，《中央日报》1937 年 11 月 5 日。

《中央日报》1937 年 11 月 2 日。

《拉贝日记》1937 年 11 月 25 日，第 107 页。

没有发生重要的抢劫、偷盗事件。

(三)在调节管理市场秩序方面。由于长期处在空袭和空袭威胁之中,南京许多商家不得不关门停业,这严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为此南京市政府要求“各商店警报解除后,立即营业,以维市面”。市商会委员也深入各区,劝导各商店在解除警报后应立即开门营业。但除部分商家遵令开业外,整个市面并未能恢复原状。特别是市内的同济、公济等5家典当业自停业之后,影响贫民生活甚大。10月1日,南京市社会局和警察厅联合颁发布告:“有关必需品商店绝对不准停业,如不遵照办法即注销营业执照。”但到了9日,仍有少数商店仍未开门,警察厅长王固磐只得再次出面劝导各商店复业。随着战争形势的紧迫,市内停业商店却越来越多,10月下旬,南京最为繁华的太平路一带,“开业者不过四分之一,较大饭店全部歇业”。到了11月份,整个街上十分萧条,几乎所有商店都关了门,11月26日,城内最后一家卖外国货的商店也关了门。

为了供应市民日常生活用品,保证市民生活的正常需要,南京市政府于10月1日专门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会,组织货源,供应市面。据报道该会曾向上海等地订购货物计总共为90万元,到11月中旬,计运进药品、饼干、罐头、肥皂、电筒、毛巾等货物15种,价值21万元左右,并将其分配给国泰商号、兄弟商店、美新商店等市内28家分销处销售。而同民生关系巨大的米粮和煤炭,在政府积极调集下,货源充足,基本能满足市民的需要。9月2日,《中央

《限制商店任意停业》,《中央日报》1937年10月1日。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年10月2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页。

《魏特琳日记》1937年11月26日,第167页。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8日、19日。

日报》以《京市民食无虞,下关粮价疲滞,存货山积来源甚多,各地丰收销数不畅》为题作了报道,报道称:“本京下关麦粉市价,两周以来,无甚出入,闻销数疲滞,存货甚多,又上江一带之秋收多属丰稔,连日运来新米之船甚涌……虽值非常时期,关于米粮之供应,绝无问题,粮价且较往年有所降低。”11月17日,《中央日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京市米粮,近来存货愈形充裕,昨日由各地到货,计划三千余石,河行米价,最高为八元二角,外江机米,则为六元余,故米市门售,最高价格在九元左右。”煤炭货源也不紧张,市民“可随时向南京市煤炭消费管理委员会请领普通购煤证,以凭购煤,如所需无多,即可经向各煤炭店号购买,无须领证”。

在战争非常时期,南京市物价尚属稳定,一度曾有商家乘机抬高物价,囤积居奇,但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严加取缔,除一些紧缺商品如洋货、杂货及棉布、丝织品、毛织品、卷烟等价格比战前上涨了一倍外,其他商品基本保持正常,有些商品甚至还出现了降价促销。如《新民报》曾连续刊登南京牧场消毒牛奶大减价、白报纸、油墨减价出让等广告。

(四)在保护和安置市民方面。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持续不断的空袭对南京市民的生命安全威胁最大。政府在加强空中防卫的同时,一方面进行防空防毒知识的普及宣传,如市政府四处张贴布告,告诫市民“敌机来袭时必须静避”,“仰视街中有杀身之虞”。8月25日,南京市组织了1000多名国民党员走上街头,挨户宣传

《京市存粮充裕,到货畅旺,米价平定》,《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7日。

《京市煤炭消费,存煤足够应用》,《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7日。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年10月2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14页。

有一段时间,南京市曾不法商人乘机囤积居奇,轰抬物价,但不久经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市政府出面干预,并将轰抬物价当作汉奸论处,物价乃渐趋平稳、下降。

防毒。 另一方面,在政府各机关的积极推动下,南京市内修筑了成千上万的防空壕,“除由军警宪机关及防护团督促市民自行构筑者外”,其他一些机关如资源委员会、南京市防护团等机关团体,在市内各交通要道和住户密集地区,也建筑了许多公共防空壕。据报道,仅南京市防护团在 10 月 19 日之前就建筑了 150 处公开防空壕,其后又奉蒋介石的指示又建筑了 50 余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鲍威尔(John B. Powell)到南京访问后,对南京的防空设施大为称赞,他说:“城内居民对于防空地窖的设备,是十分普遍和完善的,据我所知,南京各机关、商店银行、住宅以及使馆之建筑地窖者,其数不在五千,其中一部分并有电灯及蓄物室之设备。马路上,沿路也有防空的建筑,日机来袭时,正在行路的人,可以很快的躲起来。”“公共的地窟满街皆是,像是别的城市里的公厕一样的多和普遍。”看到南京出现了这么多的防空壕和防空洞,在南京生活了近 20 年的美籍教授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不无解嘲地说:“我们正迅速返回到洞穴时代。”遍及市内的防空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民伤亡人数。

为了减轻城内市民不必要的牺牲,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之后,内政部曾颁布《接近战区地域迁移妇孺办法》,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协助接近战区的妇女儿童的疏散,“并予以种种交通上的便

《中央日报》1937 年 8 月 26 日。

《中央日报》1937 年 10 月 16 日。

《一外国记者谈首都防空》,《大公报》1937 年 10 月 5 日。

《南京在空袭下》,《辛报》1937 年 10 月 19 日。

《魏特琳日记》1937 年 8 月 31 日,第 35 页。

利”。但是,在南京不可避免即将陷落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所统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 600 辆汽车和 220 余只民船,都用在了军事和国民政府西迁上,“国府西迁后,各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尽管 11 月 26 日马超俊市长专电交通部,希望“西迁各船抵达后,即续回迁送难民”。显然,到南京沦陷之时,这些船只无法赶回南京的。

考虑在日军攻占南京时,仍将有大量贫民滞留南京,南京市政府和军事当局对西方人士酝酿成立的南京安全区给予了积极配合和支持,并计划向安全区提供 10 万英镑、3 万担大米、1 万袋面粉和一些食盐。南京市政府设想在情况紧急之时,将安置市民的责任托付给 20 几名外国人。12 月初,当日军向南京逼近之后,中国守军出于作战的需要,开始烧毁当地居民的房屋,“人们要求那些住在城郊接合部、房子被烧的老百姓躲进我们的安全区”。8 日,南京各城门基本上已对市民关闭了。11 日,“下关沿江一带所有房屋,凡可供敌方利用者,现已由军队纵火焚毁,各支路现已用沙袋等物堵塞,避难者仍纷纷挟其少许用物趋入安全区域”。事实上,南京市民至此只能逃往安全区了,因为早在日军还未进逼

《接近战区地域迁移妇孺办法》,《中央日报》1937 年 11 月 14 日。

《驻华大使川越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 年 11 月 1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17 页。

《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1937 年 12 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 58 页。

《马市长关怀难民》,《中央日报》1937 年 11 月 26 日。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Harold John Timperley)著,马庆平、万高潮等译:《侵华日军暴行录》,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1 页。

〔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资料集·美国关系资料集》,青木书店 1992 年版,第 390 页。

《拉贝日记》1937 年 12 月 7 日,第 145 页。

《大公报》1937 年 12 月 11 日。

南京之时,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曾下令撤消下关至浦口的轮渡,从而断掉了市民和守军唯一撤出南京的可能途径。

三 战争威胁之下的市民心态

南京市民真正感到战争恐怖是从8月15日日机空袭南京开始的。空袭不仅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而更为严重的是其对市民心理安全感的巨大冲击。据统计,仅从8月15日开始到10月15日仅两个月期间,南京受日机“轰炸共65次,计平民死200余人,伤300余人,因被炸起火者18起,房屋炸毁者2000余间”。此后,日军更是加大了对南京的空袭力度,到12月13日,日机对南京的轰炸次数的总数在110次以上。如果将那些拉了防空警报但日机并未飞临南京上空,或被中国空军击退而未能对南京实施轰炸的次数算上,则南京市民在每个晴天几乎要受到3次以上空袭和空袭的威胁。

南京城内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声和飞机重型炸弹凄惨的爆炸声,此伏彼此,互相交错,而且城内还不时可以看到被炸市民的惨状,市民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与日俱增。起初,人们对空袭警报声十分敏感,甚至远处轮船和火车的汽笛声也会使市民心惊胆战。战争的威胁使许多市民被迫逃离南京,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大都坐船向长江上游的内地“跑反”,有些市民则前往苏北、皖北等地

刘斐:《南京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谭道平:《南京卫戍战》,转自《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1、31页。

《中央日报》1937年10月25日。

〔日〕笠原十九司:《南京难民区百日》,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9页。

《魏特琳日记》1937年10月22日,第114页。

投奔亲友,还有一部分人则迁往南京近郊各县乡下暂避。但是,除了一部分政府公务人员因工作需要而留在南京外,仍有相当一部分贫民因没有能力迁移而被迫留在南京。到 11 月初,南京人口曾一度出现回流现象,南京人口又回升到 50 万,因为一些躲避在南京附近乡下的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返回南京城里,以拉黄包车为生的杜克润老人告诉笔者,“由于在乡下没有生意做,所带盘缠又用完了,为了谋生我们只得返回南京”。甚至一些店主也在 11 月初回到南京重新营业,一位姚姓老板经营的卡什食品杂货店在停业 2 个多月后又重新开张。

由于日军对南京的空袭持续时间长达 4 个多月,大都数留在南京的市民在经历了空袭初期的紧张恐惧之后,对日机的空袭逐渐感到有些麻木,渐渐习以为常。一些记者观察到:“日机虽不断袭击,但南京市民对之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意……日机将飞达京市上空时,警号——笛声,立刻在全城怒吼起来,居民便很安静而秩序的避入地窖。因为日机不时袭京,因之这种动作,已成为南京市民的家常便饭。”南京市民对空袭的平静态度,使法国驻华大使加纳尔也感到十分惊讶。日本特务人员的报告中也称:“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特别是到了日军逼近南京而空袭更为激烈频繁之时,人们根本不在乎日机空袭,“近三日

刘易斯·斯迈思(Lewis Smythe):《南京战祸写真》,转自“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第 326 页。

《幸存者杜克润证言》(1999 年 10 月 7 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藏。

《魏特琳日记》1937 年 11 月 5 日。

《一外国记者谈首都防空》,《大公报》1937 年 10 月 5 日。

《广田外务大臣致驻北平森岛参事馆电》(1937 年 9 月 6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8 页。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 年 10 月 27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15 页。

来,京市昼间不在警报中者,每日平均仅二三小时,且警报早无空袭与紧急之分,轧轧机声,终日不绝于耳,究其数为几何渐已不为人所注意,而抗战活动之进行,车辆人马之往来,已不问有无警报,继续不辍”。

持续不断的空袭和空袭威胁严重破坏了市民的正常生活,甚至也改变了南京市民的生活态度。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但是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下雨天却成为人们祈求的“好天气”,因为只有阴雨天才能阻止令人讨厌的空袭。在紧张恐怖的环境下,穷人与富人的生命价值奇迹般地拉近了距离,出卖苦力的人变得比平常更有价值了,他们一天出卖苦力所得是平常的数倍。“过去他们工作一天时挣0.4美元,而现在是1美元”,而且所要干的活儿干不完。在生死无常的情况下,有些人活得似乎也更加洒脱。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的酒馆业,其生意异常火爆,如“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趋之若鹜”。但更多的贫民百姓每天都在祈求和平的到来,“老百姓是多么希望和平和过正常的生活啊!许多人天真地问我和平何时能到来——仿佛我知道这一疯狂的举动何时会结束似的”。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对此非常感慨。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中国人特别担心女孩子的安全。与往年相比,进入9月之后,南京订婚和结婚的人也突然增加了很多,在南京发行的许多报纸上,登满了结婚启事的广告,一些征婚广告

《京中空气紧张活跃》,《大公报》1937年12月8日。

《拉贝日记》1937年9月24日,第17页。

《魏特琳日记》1937年10月13日,第101页。

陶镜寰:《首都空袭中的形式》,《辛报》1937年10月19日。

《魏特琳日记》1937年10月23日,第117页。

甚至也在大报如《中央日报》、《新民报》上刊登,到了南京沦陷前夕,结婚的人更多。从 11 月 21 日起,在南京出版的中央日报因受国民政府西迁影响,一天只刊出一页两个版面,但仅有的版面中关于结婚、订婚的广告启事同往年相比显得特别多,据笔者统计,仅从 21 日到 27 日停刊的 8 天中,结婚和订婚的启事就有 50 条,其中结婚启事 36 条,订婚启事 14 条,而在 1936 年相同时间里,正常发行的南京中央日报所刊登的广告中,结婚和订婚的启事仅有 11 条。结婚和订婚人员突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都给已订了婚或成了年的女儿提早婚期,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完婚,以免日军来了发生意外”。而更多的贫民则连一些简单的仪式也没有举办,就匆忙将女儿嫁人,家境不好的丁家,尽管缺少劳动力,也只得将女儿丁荣声匆匆嫁给下关一个店铺的伙计。幸存者戴兴锦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娶了一位由城区来乡区“跑反”的姑娘。

当人们处在恐慌和无助的情况下,更希望得到和交换相关信息。到了 10 月份的时候,南京市内的许多报刊诸如《中央日报》、《南京日报》、《新民报》、《新京报》、《朝报》等大小报刊,尽管由于报纸原料紧缺的原因而不得不缩减篇幅,仍十分畅销,“有很多卖报人在街头叫卖,销路良好”,而且可邮送。除了通过新闻媒体获得相关信息外,人们更热衷于交换也许并非事实的小道消息,尽管

《中央日报》1937 年 11 月 21 - 27 日,《中央日报》1936 年 11 月 21 - 27 日。

胡华玲著:《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台湾九歌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9 页。

《幸存者丁荣声证言》(2000 年 3 月 29 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藏。

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4 页。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1937 年 10 月 27 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 16 页。

政府曾多次禁止传播谣言,但效果并不显著,相反随着许多报刊的相继停刊,正当途径来源的消息越来越少,从此谣言便开始充塞整个南京。“我们生活在一个‘谣言’时代,四周充满了最惊险离奇的传闻”。有些谣言会带给人们生存的勇气和希望,但在日军迅速向南京推进的情况下,更多的传闻却是负面消极的,它无疑加剧了人们的忧虑和恐怖程度。

随着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的迁都、机关公务人员的撤退、日军向南京的快速推进、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及城郊地区难民的涌入等等,南京城中的市民已开始真切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氛围,恐慌与不安渗透了每个人的心中。在大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四处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在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京外国人士所成立的难民区成为人们寄托生存希望的唯一场所。人们对中国军队能否击退日军而固守南京,已开始失却信心。从 11 月底开始,就有人到处打听“安全区”下落,“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12 月 4 日,有一些难民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12 月 8 日上午,当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宣布启用难民区的数小时内,“平民移入难民区者不下三万人”。人们似乎十分相信只要住到由西方人士管理的安全区,就一定会十分安全,“安全区的街

《拉贝日记》1937 年 11 月 26 日,第 108 页。

《我们钢铁般的国都》,《时事半月刊》(福建)第 1 卷第 3 期。

《魏特琳日记》1937 年 11 月 28 日,第 169 页。

《京中空气紧张活跃》,《大公报》1937 年 12 月 8 日。

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当 12 日晚唐生智下达从南京突围的命令后,无法逃离南京的士兵也扔掉武器换上便衣躲进了安全区。

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人们如不是万不得已,决不肯背井离乡。在我们采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日军进城之前仍有相当部分市民留在自己的家中,从现已出版的幸存者证言集里,此点也可得到充分印证。人们也许对日本兵抱有相当幻想,认为他们不会伤及平民,但是,日军进城之后疯狂的烧杀淫掠,彻底击碎了市民的侥幸心理,人们再也无法留在家中,纷纷逃向安全区,在日军进城之后的 10 天中,南京城内再次出现市民涌向安全区的高峰,金女大难民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只有难民 1000 余人,但是仅 12 月 15 日一个晚上,一下子就涌进 3000 余人,22 日一天,涌入的难民人数估计达 1 万人。后来,只有市区面积 1/8 的难民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却容纳了 20 余万难民。

四 讨论与小结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数十万平民被残暴屠杀,数以万计的妇女惨遭蹂躏。虽然,经过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努力,市民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在心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准备,如向内地迁移、将女儿提前出嫁、避难安全区等,为应付日机空袭,政府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民众

《拉贝日记》1937 年 12 月 11 日,第 165 页。

参见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骆嘉刚、杨新华主编《血证》,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6 页。

工作。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他们对日军占领南京后可能出现的疯狂暴行,其认识显然不足。

首先,政府和民众对日军攻击南京的策略意图认识不足。日军对南京进行长达4个月的无差别空袭以及其后对南京的进攻,采取是一种“威慑作战”谋略,其目的是试图通过非人道的暴行从心理上彻底击跨中国民众的心理防线,使民众丧失反抗的意志,从而达到“膺惩暴支”、“速战速决”的目的。近卫曾声称:一切恐怖手段和毁灭性打击的目的在于“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而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并没有考虑到日军占领南京后会进行屠城施暴,甚至“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

其次,上海失陷之后上海南市难民区成功的运作,使得政府、民间团体及市民对南京安全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政府将保护市民的重任毫不犹豫地托付给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许多市民也认为只要届时避难安全区,在西方人士的保护下就能避免日军的伤害。但是,上海南市难民区至少有两个条件南京安全区无法具备:一是上海是国际化都市,列强利益比较集中,上海南市难民区又毗邻法国租界,且有列强支持的背景,日军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南京安全区则纯粹是民间行为,尽管这些外国民间人士倡议得到了有关国家的支持,但对日军无法起到牵制作用。二是上海南市难民区背靠外国租界,其地理位置相对比较独立,而南

[美]贝德士(M·S·Bates):《日本人在反映重大事件方面的宣传》,转自章开沅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美]贝德士(M·S·Bates):《南京一瞥(1937年12月15日)》,转自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京安全区四周同非安全区之间却没有明显界限,日军进出安全区十分容易。事实上,南京安全区的建立同日军对南京实施威慑作战的意图相违背,日军始终没有明确同意南京安全区的成立。

第三,政府和军事机关过于注重政治和军事利益,而市民的人身安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政府在迁移工作中,显然只顾及了政府各机关人员甚至相关物资,而未能考虑市民的疏散迁移,致使本想离开南京却无法购买到船票的市民和没有经济能力离开南京的贫民而被迫滞留南京。另外,在南京固守无望的情况下,军事机关并没有考虑为市民包括士兵撤出南京提供后路。

当然,政府与市民战前对日军残暴性认识的不足,并不构成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任何借口。

(作者张连红,1966 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参见罗义俊《上海南市难民区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张连红《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